

译学新论丛书

主编 张柏然 许 钧

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转向

李 菁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学新论丛书

主编 张柏然 许 钧

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转向

李 菁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转向/李菁著.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1

(译学新论丛书)

ISBN 978-7-5327-4678-1

I. 翻… II. 李… III. 翻译-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5603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转向

李菁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220,000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200册

ISBN 978-7-5327-4678-1/H·873

定价: 25.0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401196

总 序

谈翻译,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两个方面情况的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译的认识几乎是零。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译活动在两个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认;二是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翻译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对翻译的看法,渐渐地也在有关的学界形成一种偏见:翻译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翻译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得不到学界的关注和支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逐渐开始改变。

长期以来翻译家本身专注于翻译实践,忽视了对翻译问题的理性思考

与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个历史的误会。但是,丰富的实践与贫乏的理论之间所产生的这道深深的裂痕却不能完全掩盖在数千年的翻译历史中。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提出了种种问题和困难,而面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翻译家们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因为它们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们对翻译理论思考的忽视,并不说明翻译就没有理论研究的必要,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种种问题因为翻译家的忽略便不存在。

事实上,在漫长的翻译历史中,翻译家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着形式多样的丰富实践,虽然对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还没有以一种清醒的理论意识去加以关注,但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手法、策略,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体会,尤其是他们从中悟出的一些道理或原则,是一笔笔非常珍贵的遗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弥足珍贵的译事经验,由于学界长期以来没有予以重视与关注,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被历史所尘封,无法发出其耀眼的光芒。

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批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论意识的学者,如前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加拿大的维纳与达尔贝勒内、法国的乔治·穆南等,试图以语言学为指导,打开翻译研究的大门,将数千年来一直处在技艺层面的翻译经验纳入理论的思考、系统的分析与科学的探索范围。到了 70 年代,出现了以美国尤金·奈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理论家,他们不断拓展翻译研究领域,将翻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翻译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后,翻译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被历史尘封的一笔笔珍贵的翻译遗产。他们一方面追踪历史上的重大翻译事件,将翻译家的实践置于宽阔的历史空间加以认识与定位;另一方面对伴随着翻译活动而产生的点滴思考与经验体会加以梳理与探讨。以现代学理对传统的翻译经验加以阐释,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深

化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同时,客观上也促使被历史遗忘或忽视的翻译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果说翻译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冷落,处于历史边缘的话,那么正是借助现代学理,借助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并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活动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占据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从历史的边缘开始走向中心。

在把翻译从边缘推向中心的历史进程中,语言学家们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如费道罗夫、卡特福德、维纳与达尔贝勒内、乔治·穆南等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贡献是多方面的。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把翻译从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为翻译研究打开了科学的大门,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了翻译研究科学的性质,将过去近两千年来一直在经验层面讨论或争论不休的问题置在科学的层面进行探讨。但翻译活动十分复杂,涉及的因素多,范围广,有关翻译的许多问题,如翻译者的主观因素、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移植、影响翻译的社会、政治因素等问题,在语言学层面难以展开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翻译历史上的众多现象也无法得到辩证的解释。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途径暴露出的这些局限,不仅使其他学科理论的介入显得非常必要,更为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探索空间。

当回过头去,对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所走过的路作以回顾性的审视时,我们不难看到以下几点:一是翻译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所未能达到的;二是翻译研究的途径得到不断开拓,各种翻译研究流派纷呈,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三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越来越受到其他学界的关注与承认。在国外,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起,就有学者开始对 50 年代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状况进行分析与总结,如加

拿大的罗贝尔·拉罗兹、英国的埃德温·根茨勒,他们分别于1989年与1993年发表了同名著作《当代翻译理论》。前者以翻译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为核心,对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与思想进行评述;后者则根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以不同的观点和重要著作作为依据,将当代的翻译理论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等五大流派。香港的陈德鸿与张南峰编写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收录了西方20位重要翻译理论家主要著作的部分章节的译文,这20位译学理论家中,除德莱顿、泰特勒、施莱尔马赫3位之外,其余17位均是当代的。根据编者的划分,西方译学研究界的这20位代表人物被列入6大学派: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除传统的语文学派,其余的5个流派都是近50年来发展起来的。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的绪论中,两位编者这样说道:“西方的翻译理论,除了语言学派和传统的语文学派之外,还有近一二十年才兴起或盛行的翻译研究学派,以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如果再把我们的视野扩大一些,还可列举出符号学派、交际学派、语言哲学派、文艺学派等翻译流派。从历史上长期以来“不入流”的翻译经验之谈到20世纪末令人眼花缭乱翻译流派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的理论研究开始或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透过这些被冠以各种名称的翻译思想或观点,我们不难看到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翻译进行研究。以语言学的理论指导产生的研究成果被统称为“语言学派”,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参照的研究,被冠以“女性主义翻译流派”,总之,一种理论的介入,从积极的角度讲,都会给人们认识与研究翻译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客观上确实为翻译研究拓展了巨大的空

间,为翻译研究注入了科学的活力,渐渐地从边缘开始走向中心。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活动,涉及面广,若仅仅局限在一个领域对之进行研究,无法揭示其性质及活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必定具有综合性。但是,当各种学科的理论介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后,当我们在为翻译研究由此进入全面发展而欣喜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种种理论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如同“盲人摸象”,每一种理论流派所认识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揭示的只是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难以深刻地反映翻译活动的全貌。此外,在理论的层面上,从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看,还出现了“理论+翻译”的两张皮现象,有的理论只浮在表面,难以真正起到指导翻译研究的作用。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其吞食、并吞的趋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面对这一危险,我们不能不清醒地保持独立的翻译学科意识,从翻译学建设的高度去系统地探索翻译理论问题,而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支持下主编的这套《译学新论丛书》正是向这一方向努力的具体体现。

《译学新论丛书》有着明确的追求:一是入选的课题力求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能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研究力求具有系统性,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论证和翔实的资料保证研究的质量;三是研究力求开放性,其开放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要把握国际翻译理论研究前沿的进展状况,特别要在研究中具有探索的精神,力求有所创新。但愿在翻译界同仁的支持下,在各位作者的努力下,我们的追求能一步步得以实现。

主编

2008年8月18日于南京大学

总
序

前言

西方的翻译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翻译研究只是作为传统语文学的一个分支,这一阶段也由此被称作“语文学式的翻译研究阶段”。这一阶段人们对翻译的研究只限于一些随笔式、印象式的散论。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西方的翻译研究走入了结构主义现代语言学阶段。翻译研究者试图借助结构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来建构译学理论。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是 Eugene A. Nida,他借鉴了乔姆斯基的表层结构/深层结构的转换理论,对语言进行抽象的深层次的分析,寻找它们的共同之处和普遍规律,以证明语言之间的可译性。他还构建了一个翻译的解码——编码模式,奠定了“翻译即科学”的翻译观。这一翻译观完整地体现于其著作《翻译科学探索》中。此外,J. Catford 也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代表,他的专著《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是英国翻译理论语言学派的代表作,堪称翻译理论发展的里程碑。到了 80 年代,西方翻译研究发展到解构主义研究阶段。这一阶段的翻译研究走出了文本中心的藩篱,从内部研究走向了外部研究,以文化学派为代表的各种学派层出不穷,如多元系统学派、操纵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女权主义学派等等,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完全抛弃了结构主义现代语言学阶段的观点和成果,只对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感兴趣,意在揭示翻译实践与研究中含有的

文化与政治因素。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包括文化学派的 Andre Lefevere 和 Susan Bassnett 和操纵学派的 Gideon Toury 等等。

国内的翻译研究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中走过了西方半个多世纪的历程,经历了与西方类似的三个阶段,即从语文学式的研究模式到 80 年代中期的结构主义的现代语言学模式,再到 90 年代后期的解构主义研究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对 Nida 翻译理论的译介和评述几乎成为我国翻译研究的全部内容。谭载喜的《奈达论翻译》以及金隽的《论翻译》(与 Nida 合著)的出版,使得奈达的翻译理论在我国译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我国学者也尝试着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 and 对比语言学的理论成果,探讨英汉转换规律,如吴新祥与李宏安合著的《等值翻译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 90 年代后半期,我国的翻译研究也转向了多元化、多角度,辜正坤教授提出的“多元互补的翻译标准”是这一转向的标志。西方解构主义阶段翻译理论的译介和评述成为国内翻译研究的主要内容。

尽管翻译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但从近些年的发展来看,翻译学的学科地位没有得到进一步巩固究其原因,就是翻译学的研究重心发生了偏移:影响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取代了语言问题,成为翻译研究的热点。尽管我们不能否认外部研究的价值,但翻译在本质上仍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跨文化交往实践,这就决定了翻译研究的首要任务就在于指导译者更好地把握源语文本的意义,并尽可能忠实地将源语文本的内容传达给目的语读者。因此,语言问题理应是翻译研究的本体。只从语言的角度研究翻译,当然不足以提出和解决翻译的全部问题,但它是全面研究翻译所有问题所必须的,因为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研究的成果,可以为客观地解决其他一些重要课题建立牢靠的基础。然而,翻译中的语言问题在译学发展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两个阶段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结构主义译学研究将分析哲学人工学派的语言理论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作为其语言学基础,

使翻译研究超越了主观印象式的经验总结而走向“科学化”,并为翻译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打下了基础。但它把翻译简单地归结为一种机械的语言转换活动,以追求语言对等转换规律为目标,忽略了翻译的人文性和复杂性,因此许多翻译现象得不到合理的解释。解构主义译学研究的语言学基础则融合了本体论语言观和解构主义语言观,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维度,但它的非理性和对翻译研究本体层面的忽视,又使得翻译活动受到消解,使得尚未建成的翻译理论大厦即将成为另一座巴别塔。因此,这两种译学研究范式所选择的语言学理论都不适于作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基础,不适于指导翻译研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语言学理论所研究的对象并不是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语言。翻译是人们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一种人类交往实践,它所涉及的是人们使用的日常语言。我们亟需一种以生活世界中日常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理性的语言理论来指导翻译研究。因此,本研究试图在西方语言哲学丰富的理论资源中找寻适合的语言理论作为翻译研究的主干框架,以期为翻译研究奠定坚实的语言学基础,引导翻译研究向生活世界回归,并为翻译的内部研究(语言层面)与外部研究(文化层面)架起一座桥梁。

本研究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首先阐述本课题的选题背景及意义,然后对国内外翻译研究与语言学相结合的路径进行回顾与梳理,总结所取得的成绩,反思其不足之处,并指出今后发展的出路。作者指出,尽管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为译学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但这条翻译研究的路径走得并不平坦。从诞生之日起,文艺学派就与之争锋相对。特别是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解构主义者甚至以一种反理性思维,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进行清算,几乎全然否定了语言学路径所取得的成果。与其他学派的交锋,让我们认识到翻译研究的路径的确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其一,忙于借鉴语言学理论的最新成

果,可能会使翻译研究者们疏于对这些层出不穷的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和相互关联进行思考,缺乏对这些语言学理论背后的哲学基础的反思,结果造成翻译研究始终缺乏一个坚实的语言学基础。这样一来,就容易导致研究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使重复而又缺乏深度的研究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非常不利于翻译理论的建设。其二,语言学翻译理论目前正朝着语篇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和心理语言学的方向发展,而且这些新的语言理论也不再像结构主义语言学那样把语言视作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而是将文化、语境、主体等因素纳入对语言的考察,但它们并未具体深入地探讨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如何结合的问题。而这将是译学研究下一步发展中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部分首先指出语言哲学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意义,其重要性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对于翻译的本体研究有着很强的指导作用。语言哲学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它的首要任务在于通过语言分析,澄清词语和语句的意义,使我们能够以适当的、准确的方式使用语言,从而有效地表达我们的思想。而翻译归根结底就是一种语言活动,因为在翻译中译者主要是在和语言打交道。译者必须首先把握源语文本的意义,这一过程必然涉及到文本的结构分析以及如何正确理解具体词语和语句含义问题。在将源语文本转换为译语文本的阶段,译者还会遇到如何在译语中选择恰当的词和语言形式来表达原文含义的问题。因此,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不仅能为译者的翻译实践提供具体的指导原则,更重要的是,语言哲学能为翻译研究语言学基础的确立提供理论依据。其二,除了语言的意义和使用之外,语言哲学还研究语言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探讨语言在社会交往中所起的作用,分析造成误解的心理原因和社会原因以及如何避免误解等问题。这些问题对于翻译研究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翻译不但是—种语言活动,它还是一种社会交往活动,其根

本目的在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语言哲学中的一些重要理论能使我们认识到翻译活动必定要受到语言系统外部因素的制约,并能指导我们真正深入文本语言来研究外部因素对翻译活动的操控和影响。同时,我们还能借鉴语言哲学中相关理论,为保障翻译活动顺利、有效地进行建立起合理的模式和规范。其三,从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来看,翻译研究者事实上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语言哲学理论为指导来进行翻译研究,而且语言哲学自身的发展也在影响着翻译研究范式的改变。因此,作者接下来就对哲学“语言论转向”之后出现的两条研究路线或两大研究传统进行比较,并具体分析了它们对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解构主义多元翻译研究范式及其语言学基础的影响。结构主义译学研究的语言学基础是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与分析哲学中人工语言学派的语言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而解构主义多元译学研究的语言学基础则是建立在以下三种语言理论之上: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本体论语言观、伽达默尔的阐释学语言观以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语言观。这一部分还分析了这两种研究范式因未能选择切合的语言理论作为其语言学基础而存在的局限性。

本研究的重点是第三、四、五、六部分。这四个部分将重点分析翻译研究回归生活世界的必要性,探讨引导翻译研究回归生活世界的理论途径。第三部分首先指出,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两种译学研究范式所选择的语言学理论都不适于作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基础。它们并不能很好地指导翻译研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语言学理论所研究的对象并不是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日常语言。结构主义译学研究所依据的分析哲学人工学派的语言理论,是以人工语言或科学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尽管结构主义语言学立足于日常语言,但是其研究对象却是从日常语言中抽象出来的、排除了一切外部因素的封闭的语言系统,而不是人们实际使用的语言。解构主义译学研究所依据的语言本体论关注的则是诗意地存在着

前
言

的诗歌语言。而翻译活动所涉及的语言,是与我们人类相伴相生的日常语言,是现实生活世界中人们所使用的活生生的言语。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翻译研究应当“回归生活世界”,因为翻译活动是生活世界中的一种人类交往实践,翻译研究如果脱离了生活世界,不仅不能指导实际的翻译活动,而且这种研究也会渐渐失去意义。无论是结构主义译学研究还是解构主义译学研究实际都脱离了生活世界,背离了翻译活动的实践性和翻译活动的真正目的与意义。因此,我们必须把翻译研究带回到生活世界,这也就是翻译研究语用学转向的实质。而回归生活世界,必须采用理论的途径。所谓回归,实际就是一种态度的回归。选择一种适当的语言学理论作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基础即是引导翻译研究回归生活世界的理论途径。这种语言理论首先应以日常语言为研究对象并符合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它必须对生活世界中日常语言的性质、意义以及使用规范做出理性的反思。

第四、五、六部分具体分析由奥斯汀创立,并由塞尔继承与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哲学思想对翻译研究的宏观与微观的指导作用,并试图综合上述三种语言理论构建一种交往实践的语言观作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基础。从后期维特根斯坦开始,语言分析哲学开始转向生活世界。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关注的正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自然语言,哈贝马斯的语言理论也立足于生活世界中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所以,言语行为理论和规范语用学都是生活世界的语言理论,它们关注的是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因此,它们都是引导翻译研究回归生活世界的可选择理论途径。然而,言语行为理论与规范语用学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它们各自也都存在着一些缺陷。例如,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语言的意义与旨意力密切相关,同时又依赖于现实语境。塞尔指出,语言符号的意义是由意识的意向性所赋予

的,意义是意向性的派生形式、产生于心灵意向与言语行为构成规则的统一,并且在具体语境中得以规定。这种意义观不仅拓展了意义研究的维度,而且推动了意义理论研究从静态向动态的发展。然而,它把意义归结到言说者支配其言语行为的意识的能动作用,即意义决定于言说者的主观意向,而且否认存在着不依语境为转移的语句字面意义,这必将导致意义客观性的丧失。我们不能仅仅从心灵哲学的视角探讨意义问题,而应结合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实践活动。哈贝马斯的语言理论立足于生活世界中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他提出言语的双重结构将语言交往分为两个层面,这是对塞尔否认陈述层面的独立性而过于强调语用层面观点的纠正,展现了意义具有客观性的一面。他将句法分析、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整合于他的意义理论中,所以他对意义的研究比言语行为理论更为全面和合理。不过,他的语言观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他将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为视为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全部,因此,他对语言问题的思考忽视了语言产生的物质基础和实践根基。而且他过于强调语言对于生产劳动的优先地位,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语言观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劳动才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语言是在人们的生产劳动中产生的。哈贝马斯不仅认为语言的地位高出于劳动,人的本质在于人的语言性,还指出马克思的学说过分突出生产劳动的作用而没有重视语言交往问题。事实上,尽管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性交往中,最根本的还是“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但他将精神交往同物质交往一样视为人类交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高层次。在对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研究中,只不过马克思偏重于前者,而哈贝马斯偏重于后者。其实,二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且精神交往归根结底是物质交往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的论著来讨论语言哲学问题,也没有在论及别的相关问题的著作中对语言问题进行具体系统的阐述,但他

们对于语言有着精辟的论述,而且他们对语言的看法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实践的基底上的,是一种实践唯物主义的 language 观。这种 language 观十分重视语言与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语言交往是人类交往实践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翻译活动正是人类的一项以语言为媒介的社会交往活动,这就决定了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 language 观为指导,从人类实践的角度来思考整个翻译活动以及翻译中的语言问题。因此,我们不宜直接将上面提到的某一种语言理论作为引导翻译研究回归生活世界的理论路径,而应当从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出发,对言语行为理论、规范语用学这两种语言理论中的合理成分进行整合,并综合实践唯物主义 language 观,作为翻译研究中语言问题的理论基础。

前
言

本研究采用了质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本研究采用了:(1)历时与共时比较方法,这主要体现在,本研究拟对国外和国内的翻译研究语言学路径的发展进行回顾,并比较了同一时期不同翻译理论家观点的异同和不同时期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发展变化。本研究还对西方语言哲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并比较了在不同语言哲学理论影响下形成的翻译研究范式及其语言学基础。此外,本研究还将分析某个理论家对前人观点的继承与发展。(2)跨学科的方法:翻译是一门综合学科,必须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为自身的研究任务和目的服务。由于本研究的首要目的是为翻译研究奠定语言学基础,因此主要借用了语言学、语言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中的重要理论,具体包括言语行为理论,规范语用学,交往行为理论,交往伦理学,生活世界理论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哲学思想等。(3)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本研究既有宏观的理论描述与建构,又有理论与翻译实践层面相结合的探讨。比如,本研究既探讨言语行为理论、规范语用学对翻译研究的宏观指导作用,同时又分析言语行为意义论、言语的双重结构划分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此外,本研究还将建构了交往实践语

言观作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基础。

本研究的创新之一在于将“回归生活世界”的概念引入翻译研究,提出应当选择一种切合的语言理论作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基础,以引导翻译研究回归生活世界。传统形而上学构造了一个外在于人、独立自存、预先给定的科学世界,认为这才是“真实世界”,而生活世界只是一个“假象世界”。而现代哲学家都拒斥传统形而上学,主张摒弃抽象的科学世界,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他们面向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不再追寻事物客观规律,而注重事物对人的价值关系,强调人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在结构主义译学研究阶段,人们将语言视为无主体性、不受语境制约的精确工具和理性的典范,将翻译研究引入了科学世界中,将追求语言对等转换规律作为惟一的目标,全然忘却了翻译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不同文化间的交往和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从而导致翻译研究走入一种固步自封的危机状态。而在解构主义译学研究阶段,语言只是作为纯思辨的对象。这种存在论语言观不仅使语言与生活世界相脱离,还颠倒了人与语言的关系,使译学研究越来越神秘,越来越哲学化,这是与翻译活动的实践性相悖的。上述两种研究范式之所以脱离了生活世界,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所依据的语言理论分别是以科学语言和哲学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而非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日常语言。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还在于深入分析了西方语言哲学对翻译研究发展的影响和指导作用,而对西方语言哲学中相关语言理论的梳理和理解也是本研究的难点。此外,本研究提出的“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转向”并非只是简单的语言学回转,而是对翻译研究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超越。它意味着翻译研究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回归,强调翻译研究的重心仍应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语言转换规律和使用规范,同时也注重翻译研究文化层面与语言层面的结合。